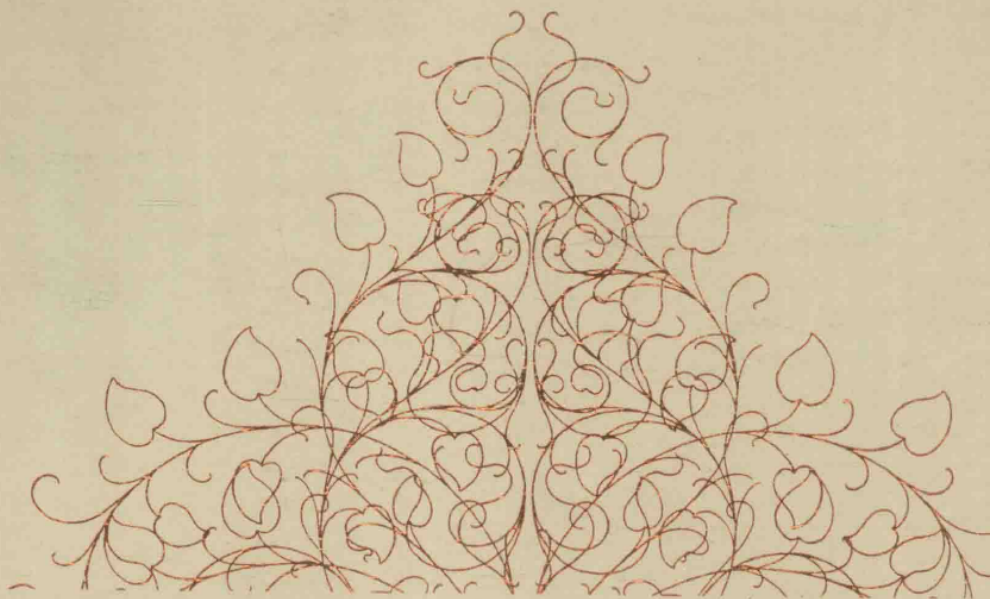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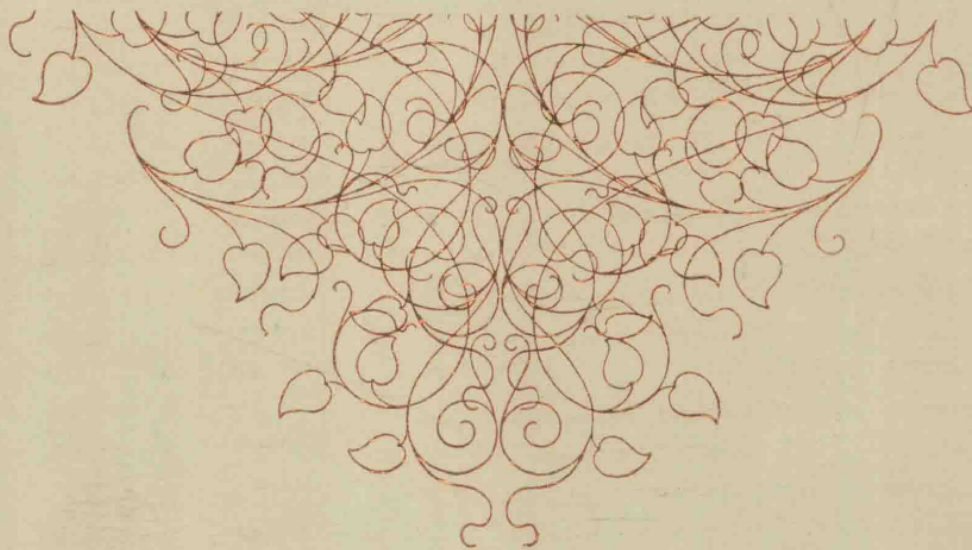




浇灌上海

——上海教育 60 年见证 JIAOGUANSHANGHAI



王厥轩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浇灌上海

——上海教育 60 年见证

JIAOGUANSHANGHAI

王厥轩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浇灌上海:上海教育 60 年见证/王厥轩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 - 7 - 5326 - 2031 - 9

I. ①浇...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1597 号

责任编辑 张亚芳

装帧设计 姜 明

浇灌上海

——上海教育 60 年见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 ewen. cc www. cishu. com. 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2 插页 5 字数 159 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031 - 9/G · 741

定价: 3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6162648



作者简介

王厥轩，中共党员，研究员。其经历：先为老三届，后为77级大学生，先后辗转七个岗位：十年机关干部（市教育局办公室、调研室，市政府教卫办）；十年研究所所长（上海智力所、高教所、普教所）；十年市教研室主任。

作为上海课改的主要执行者，他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倡导为学生提供五种学习经历，推进学科教学与“两纲”融合，率先在全国改革研究型、拓展型课程，建立与完善教学、训练、活动、实验、评价等五大系统。在深入基层学校宣传课改思想、进行教师培训、指导课堂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与发展，对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课程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著述颇多，约二百万字，研究成果在国内有一些影响。他学养丰富，厚德载物，为人大气，淡泊名利，在上海教育界留有口碑。



研究时，总是把“两纲”张冠李戴，摆来卖去的信笔加以
拼凑与编造。

一睹名記對推也“兩側”，高屋建瓴，這豪情壯志與軍旗。有的伴
事是洪基現於洪基的。感念恩德。一件是，刻寫到“兩側”這碑中，一睹

书记正兼任此职。大体的两个城市是进行教育的观念。在黎黎的2012年，

她陪同上海使领馆修改来华计划的“西湖”初稿。一男生，2006年9月29日。

在市中心开展了“两湖”教子展示诗。一随书记 / 李海吉记、~~李海吉~~、李海吉
张兰勤全力帮助听了两首诗。在接着影片

以席佑忠，她听了几个区的区长和区委书记的发言，觉得，一阵规矩

大声发问：“顾野王吗？我想听他的发言。”当时，我正^坐在严家驹训导台的身后，匆匆间，我就“两腿”爬进他的发言中发言。事后洪慧书记告诉我，

“厚黑”文则是一堆书证能作证。但她灵机一动，决定让信讲。”“一陈

听了你的来信后，事后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清楚的，我放心了。’”

其二，重视每个阶段，指出一个阶段的成就与有待采取措施

作者手稿

其二，重视每个阶段，指出一个阶段的成就与采取的措施

序

龚学平

厥轩在教育系统工作三十余年,先后辗转七个岗位:十年机关干部(市教育局办公室、调研室,市政府教卫办),十年研究所所长(上海智力所、高教所、普教所),十年市教研室主任,在上海教育界也称得上是一位资深教育专家。我曾分管上海教育多年,对教育一往情深。近读他的大作《浇灌上海——上海教育 60 年见证》,感受颇深,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在目。

上海是出教育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教育家,如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杨贤江、匡互生、俞庆棠等,他们都曾在上海办过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办学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又出了一批教育家,如本书所记录的舒文、陈琳瑚、杭苇、姚庄行、吕型伟、左淑东、唐秀颖、唐盛昌等,他们不仅是上海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上海教育 60 年的见证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引领了一个时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思想,有才华,有独立的人格;对教育事业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地追求;学识渊博,修养深厚;胸襟坦诚,磊落光明。他们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学识魄力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或两代人,为上海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教育事业是由教师创造的。无可否认,在整个事业发展的进程中,著名人物的探索与创新使教育事业更加灿烂。本书记录了上海教育界一些著名人物:于漪,是上海和全国教师的先进典型,是语文战线一面光辉的旗帜;吕老,今年已 92 岁高龄,是我的恩师,上海刚解放时他参与了接管

市东中学,在上海 60 年教育史上,普教界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与发展,都渗透着他的思想与理论,人们用中国普教界“活化石”和“国宝级人物”赞誉他的杰出贡献,他当之无愧;左淑东是上海幼教事业的奠基人、先驱者和总指挥,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在全国领先,上海幼教在国际和国内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间的每一步,都是在左淑东的引领下走出的,她的为人、人品、思想、修养、道德、境界,成为上海幼教战线所有教师的共同财富;毛蓓蕾是上海优秀班主任的杰出代表,尽管她已谢世,但她提出的班主任工作的思想与做法,仍然是今天年轻班主任可奉为经典的珍贵遗产;唐盛昌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名优秀校长,他的思想、理念,他办教育的独特个性,他对办学的深刻见解,都代表着上海教育界校长办学中的最高水平。

我要特别感谢厥轩,他抢救和保存了上海教育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陈琳瑚在上海广大教师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极好的口碑,但记录他做事、为人的资料极少,厥轩把他记录下来了;左淑东为上海幼教事业所作的贡献难以估量,记录她的文字也很少,厥轩把她记录下来了;吕老自己写的文字不少,也出了多本专著与集子,但像像样样记录吕老的文字却很少,厥轩也把他记录下来了,并且把吕老写得活灵活现。

我认识厥轩时,他还刚刚四十出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温文儒雅,才思敏捷,为人大方,淡泊名利,是教委的一支笔杆子。一晃 20 年,他居然也到了退居二线

序

的年龄。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退居二线,就为上海教育界做了这么一件富有纪念意义的大好事,而且他的散文写得这么好,文字质朴无华、平实易懂、琅琅上口,朴实的文字中蕴含深刻的思想,很有见解。因此,当厥轩提出邀我作序时,我欣然命笔。

2010年9月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复旦大学上海视觉
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原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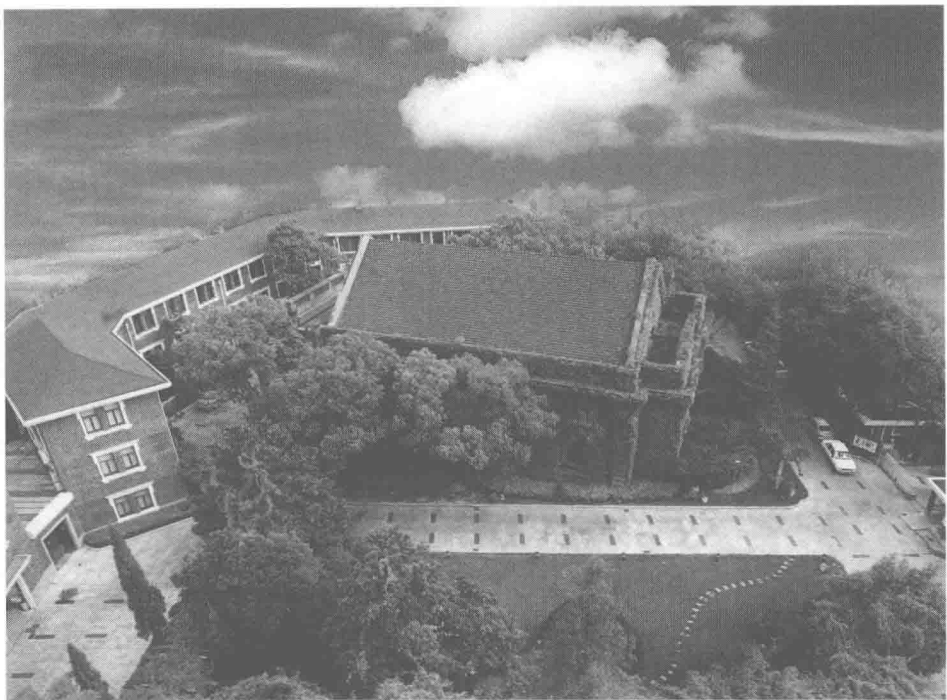
序	1
在市教育局工作的日子里	1
我的师傅曹余章	9
著名教育家杭苇	14
带领市重点中学校长去清华、北大	21
舒文：一位思想解放、勇于实践的教育先驱	27
陈琳瑚：一位真诚信仰马列主义的教育家	41
唐秀颖打电话给姚庄行	55
用心灵点燃机关干部的热情之火——记市教育局局长姚庄行	59
吕型伟：一位被称为普教界“活化石”的睿智老人	68
上海幼教事业的奠基人、先驱者和总指挥——记左淑东	82

我的恩师于漪	94
“我是属于孩子的”——记全国优秀班主任、特级教师毛蓓蓓	109
在华师大读在职研究生	119
我心目中的张伟江	129
一位朴实无华而令人尊敬的教委主任	137
年轻而富有才华的晓明主任	149
铁慧书记：上海德育的创新者与引路人	160
校长思考，至少要比社会发展提前十至二十年——对话上海中学校长 唐盛昌	174
今天怎样培养你的孩子——王厥轩在上海东方讲坛的演讲	191

在市教育局工作的日子里

我是1982年2月5日到上海市教育局报到的。记得很清楚，机关应当是8点30分上班，我是8点钟不到就跨进了陕西北路500号大院。眼前的景色一亮，一座教堂被整片的爬山虎围裹着，满是枯藤，而一到夏天，这里大约会是青藤爬满。走近一看，上书“西摩教堂”，建于1920年。沿着院内小路前行，一幢红色的三层办公楼掩映在绿树之中。大院内的右侧，有一幢两层的小楼，透着神奇感。初来乍到，我不敢贸然进去。大院内的左侧，是一幢我很少见到过的小洋楼，墙壁红砖中镶着白条，显得特别庄重，整座洋楼透出一种威严。“这大约是我报到的地方，它是上海教育系统的最高权力机关。”我自言自语地说，内心充溢着一种神圣的感觉。此时，不知怎的，脑中会跳出一幕一幕的情景：三年困难时期，我因肚中饥饿，上课时突然晕倒，一位名叫尤工的才二十多岁的女语文教师，背着我这个身高接近1.70米的男学生，步履蹒跚地往新村走去；十年动乱中，家中遭受毁灭性的抄家，一家三口依赖29元钱艰难地生活；1977年我考上大学时，老母噙着泪水，喃喃地说，我们一家翻身了……画面一幅一幅出现，突然眼前又显现气派的洋楼。我对着这座庄重的洋楼轻声地说：到这儿来，我就是来好好工作的。

我被分配到市教育局办公室当秘书。当时办公室主任是曹余章，副主任是樊超烈。还有一位秘书沈勉荣是科长，他虽然学历不高，但文字功底不错。沈勉荣告诉我，他一年发的简报有一百七十多份，光教育部转发上海的就达到三分之一左右。每次说到这些成绩，他的脸上会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喜悦，我听了很是羡慕。不



陕西北路 500 号大院

过,沈勉荣很快就离开了办公室。这时我才知道,我是来接替他的工作的。办公室内还有一位名叫周玉桂的女同志,是内勤。她承担办公室的信件处理、会务安排和各类杂事,非常辛苦。

80 年代初期的市教育局,一共十多个处室,人员加起来百把人。当时的体制是上海所有的初中以上的校长,都是由市教育局局长任命的,上海初中以上学校发

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比如学校撤并、学校之间的纠纷),也都是市教育局局长处理的。应该说,在这种体制下,机构还是很精简的。我记得的处室是:教育局办公室、党组办公室、人事处、计划财务处、师范教育处、教学处、普教处、幼教处、中专处、工农教育处、成人处、体卫处、德育处,其他的处室,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当时,《上海教育》杂志社和《少年报》报社也在500号大院里,这两家宣传喉舌是直属市教育局的,但编制不属机关干部。

当时,局办公室、教学处、普教处是大处室。教学处人多一点,大约有三四十位,各个学科的教研员统领着全市的教学研究与教学指导,保证上海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而局办公室与普教处,也就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一般是一位正处长,一位副处长,两位科长,其他都是科员。要想从科员升为副科长,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至于幼教处、体卫处、德育处等,都只有两三个人,直接指导一个系统,工作量是很大的。

市教育局办公室分为几大块:局长办公室、办公室、外事组、信访组、图书管理组、后勤组、打字组等等。我记得局长办公室有史国明和韦高安,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安排局长办公会与局务会议,安排局长的工作日程,处理写给局长的信。一般是八点多钟上班,晚上八点多钟还难以下班,工作非常辛苦。办公室主要是处理文字和对外代表市教育局,比如:编写各处室和基层学校发来的简报;代表市教育局统稿、发文;起草市教育局局长的工作报告;参加局长办公会和局务会议,然后编写会议纪要;跟随市教育局局长到基层学校蹲点、调研、总结经验,等等。当时我33岁,由于年轻,总的感觉是工作虽辛苦,但比局长办公室的两位秘书有劲,他俩一天十多小时不能动,而我相对自由多了。外事组当时三个人,

我记得是蒋福良、杨国顺和孙宏。由于那时教育正处在百废俱兴时期，而外事组又恰好在我们隔壁房间，我经常看到他们三个人，一会儿接待日本代表团，一会儿接待英国代表团，跑进跑出，非常忙碌。信访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名叫应文静，当时也只有二十七八岁，差不多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市的方方面面人士，也不见她停过。图书管理员是两位，一位年纪大一点，叫吴恒基，另一位叫薛华胜，她俩都已退休。据我回忆，当时市教育局图书馆的教育档案在上海，甚至在全国都是比较齐全的，上海和全国各地来查教育档案的人不少。吴老师温文儒雅，谈吐很有分寸；薛老师耳朵有点背，但办事思路很清，很干练。她俩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很深。后勤组包括驾驶员、食堂工作人员、500号大院的管理人员，也就是两三个人。我到市教育局工作不久，一位叫张文碧的同志也调到市教育局，他抓后勤。人事处的同志告诉我，张文碧来自空军部队，是一位团级干部。张文碧同我差不多年纪，我们是一个党支部的，后来彼此很谈得来。打字组是两位女青年徐达琴、何艳琴，当时也就二十多岁。教育局要处理的文字量是非常大的，只见她俩从早到晚，头也不抬，一个劲地打字，星期六、星期天差不多都要加班，从来也没有听到她俩半句怨言。还有一位是收发信件的，名叫祝连根，他也是从部队转业的，据说现在也退休了。市教育局的信件是一麻袋一麻袋装的，要分发到每一个处室，有时急件要直接到市邮政局去发，也见到他跑进跑出。市教育局办公室是一个很温暖的集体。

我在市教育局工作，职位升得很快，大约九个月的时间，已经被任命为副科长，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被任命为科长。当我被任命为科长时，办公室主任曹余章调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当社长。这一时期职位升得快，我猜想教育局领导和办公室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我自己也比较努力。

说到职位提升，很有必要把事情展开去，讲一讲 77 级。我一直觉得 77 级是很值得研究的。77 级有这样几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其一，在中国教育史上，集十多年时间才出了一批经正规招生考试入学的大学学子，这是极其少见的。从“文革”开始到粉碎“四人帮”，再到 1977 年，大约十一年时间，其间只出现过工农兵大学生，而正规的通过高考入学的，77 级是第一批。当时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达 570 万人，而被录取的大学生仅 27 万，大学录取率为 4.7%。这样低的大学录取率，标志着这一批大学生集聚精英，质量非常高。

77 级大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学生都是仓促应考而一举中的。据说，邓小平同志拍板决定恢复高考是在 1977 年的夏天，而教育部正式把这件事办下来已经到了秋天。当这个消息正式传到广大考生，基本上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我记得，当时我正带领学生去川沙学农，工宣队员打电话告诉我：“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日子，我们替你报名了。”这样，我从复习到参加高考，仅两周时间。仓促应考而一举中的，表明 77 级中许多同学基础打得很好。回想起来，当时高考题目很简单。以语文为例：一是修改病句，一句一分，共十句；一是写一篇作文，满分是 100 分。我后来了解到高考语文我得了 91 分，据说全市语文 90 分以上的共 50 名，最高分是 93 分。这个事例表明，高考题目不一定越难越好，不一定追求区分度。当然这是后话。

77 级的学生，从年龄上分是三个层面：一批是考进大学时已经 30 岁或 30 岁朝上的，他们大多是老三届高中生，包括 66 届、67 届、68 届高中生；中间一批是 25 岁至 30 岁的，他们大多是老三届初中生或 70 届的中学毕业生；还有一批是 25 岁

以下的，他们以应届毕业生居多。当时上海师大校园中有一个故事，说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同在一个班里。其实我的经历也差不多，我当时教的学生是中学 78 届的，我是 1978 年 2 月进校，我的学生是 1978 年 9 月进校。在校园里，我经常看到自己的学生，他们叫我王老师，我的脸也被他们叫红了。我请他们别叫了，我说我们已经成为同学了。这种原本是师生，后成校友，在一起共同学习的情景，估计在中国教育史上或者外国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其二，77 级大学生有理想、有追求，抱着“读书报国、知识报国”的信仰读书，怀着“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的强烈使命感读书。这一批学生的来源，基本上都是工人、农民、插队知青、返城知青，当时上海返城知青有一百万人左右。以 66 届高中生而言，有这样一个现象：1968 年毕业分配时，当时留在工矿的，参加高考的比较少；而在市郊和到外省市插队的，报考者就多一些。俗语说，逆境成才，由于境遇不好，许多人参加高考了。倘若留在工矿的同学也参加高考，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也能被录取。

考进大学的同学，求知欲非常强。他们上课时用心听讲，认真记笔记；下课后不停地问老师问题。许多老师非常喜欢这一级学生。现在回想起来，倘若把这些情景用照片拍下来，师生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喜悦之情。每到晚上，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上课的小教室里都挤满了人，灯火通明。尤其是一批年龄比较小的同学，他们在一批年长同学的影响下，拼命地读书、求知，经常是晚上十一二点钟回到寝室，星期六、星期天不回家继续攻读，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讲到这里，有必要插一段故事：1995 年我到上海教科院高教所担任所长，大约在寒假刚开始之际，我乘着一辆小轿车到五角场地区的一些大学校园转了一圈，发现除了复旦

大学的校园内还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其他大学几乎是漆黑一片。面对此情此景,我真的十分感慨。

往深层次想,77级学生是怀着比较高的理想和信仰在读书,他们承继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情在读书。因此,当要求他们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首先选择了为国家和民族读书,其次才想到为自己的命运而读书。而现在的一些大学生,我认为他们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上师大中文系77级2班全体同学合影。他们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第一排左二为瞿凯诚(时任党支部书记),第二排左三为笔者(时任班长),第二排右三为丁小禾(时任团支部书记)。